



他山之石

德国如何炼就“隐形冠军”

□ 周及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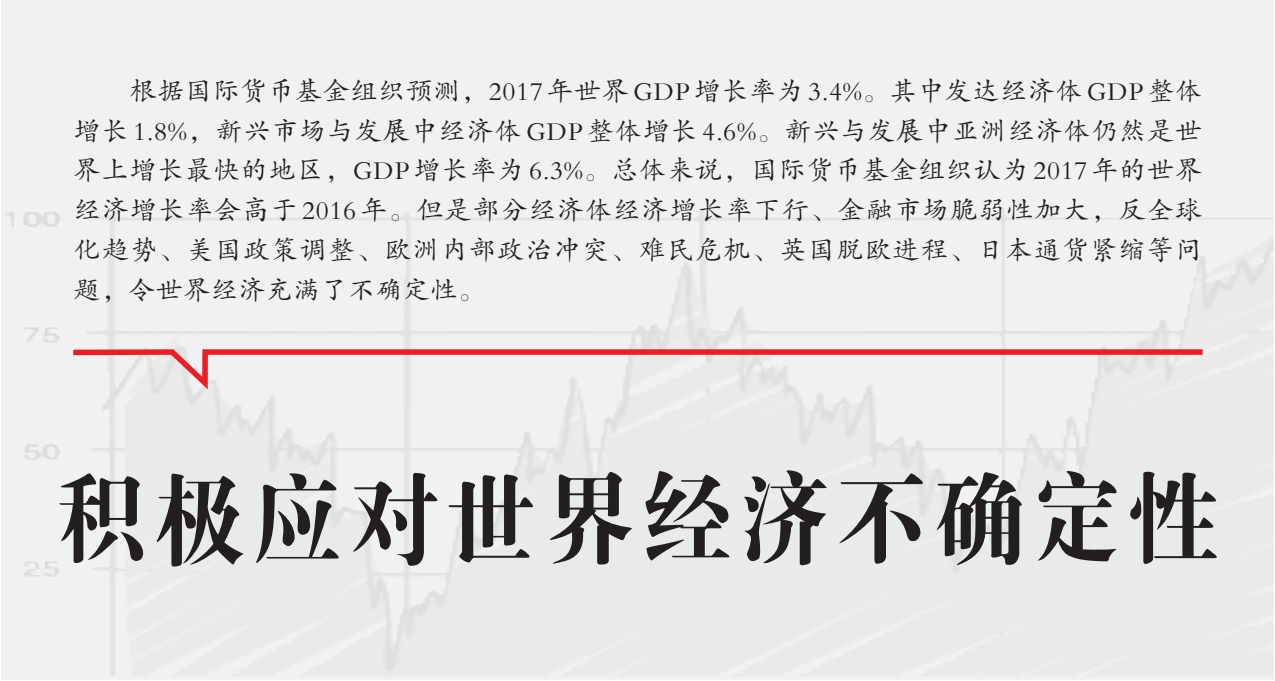
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早在1986年就首次提出“隐形冠军”理论。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强企业以外,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德国,存在着这样一批典型的优秀中小企业,它们更多的是一些闷声发大财的行业冠军企业。所谓“隐形”主要是指不为公众所熟知,而“冠军”是指细分市场的领导者。这些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内精耕细作、专注执着、坚守定力,历经千锤百炼形成了宝贵的工匠精神,其中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窄门”理念。德国企业上百年来都传承着专做“窄门”的传统理念。绝大多数企业都在专攻属于自己的“窄门”——细分行业、专一产品。与“窄门”相对应的是,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也很窄,产品销量也不大,因而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生产,员工不超过千人。从事“窄门”经营的中小型“隐形冠军”企业在德国工业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构成了其工业格局的基础,且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企业只有运用平和心态专注于其“窄门”经营,才能将技术钻研得非常精深,将产品市场和生产情况掌握得非常透彻,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技术创新、改进工艺,进而将单一产品做到极致。产品功能强大、质量优越,就能带来高附加值,进而为企业带来大量利润。同时德国社会对于这些产品质量好、技术含量高、经营业绩好的中小微企业具有很高的认可度。

“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所谓“二元制”指的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即学校与企业在政府与行业的监督下联合办学,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受教育者在学校内是学生、在行业内是学徒,在学校和企业“两地”活动,具有“双重”学习身份。德国学生经过四年小学学习后,根据成绩、爱好和家长意见进行分流,其中文化成绩较差的学生选择就读以职业教育为主的五年制主体中学,毕业后就有资格申请接受“二元制”职业教育。这些学生首先需与企业签订学徒(培训)合同,然后去企业指定的一所职业学校报到,并在行业协会登记注册。学徒通常每周有1—2天时间在职业学校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在企业接受3—4天的技能培训,培训期一般为三年。这种教育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于,在职业学校接受理论教学和在企业中实践密切结合,但以企业培训为主;其核心任务是“职业能力”培养,具体体现为个体应对现实工作情境的能力;其培训目标明确,是为特定企业的特定工作岗位量身定制,所以教学任务有极强的目的性;强调为实践动手能力强的受教育者提供精英教育,通过多种激励机制将其培养成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现如今,许多国家将德国的“二元制”发展为一脉相承的现代学徒制,移植德国职业教育课程标准,由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教学计划,以“订单式”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针对性政策扶持。德国政府历来在各种层面上尽职尽责地扶持中小“隐形冠军”企业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制定各类法规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竞争环境、成立专门管理机构以增强竞争优势、制定技术服务政府和加强技术人才培养、积极提供财税金融支持和融资担保以解决自有资本不足问题、建立信息情报中心以提供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各类商会协会的作用以提供全面的社会化服务等。最近,为进一步资助中小企业使用工业4.0设备测试自己的解决方案,鼓励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和大企业合作,帮助中小企业招聘技术人才,降低中小企业申请资助门槛,德国联邦教研部将在今明两年把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资金提高30%,每年约32亿欧元。

精益管理。德国在精益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精益管理思想,其基本战略包括拓宽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系统复杂性、恰当领导和控制原则。在当今的智能制造时代,德国构建了基于工业4.0的精益生产管理体系,并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该生产管理体系的核心要素。德国各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企业,如赛威传动使用精益管理和智能化组装线,实现了不同模块和不同系统相互之间的无缝连接。



□ 顾保国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当前,全球GDP增长率持续下降,表面看是世界经济整体有效需求不足,本质上却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要素供给下降和生产技术水平停滞共同导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出现婴儿出生率下降趋势。生产技术水平下降源于全球投资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融资约束、经济和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壁垒的影响,各国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增速放缓。投资放缓不仅对短期经济增长前景产生负面影响,还会造成单位劳动使用的资本增长放慢,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各国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增长。

国际贸易增速下降,国际直接投资稳定性不足。虽然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互相之间存在内生关系,但是国际贸易低迷还有国际贸易体制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动方面的内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第一,全球性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难以弥补成本,区域及双边贸易谈判虽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利益格局复杂,至今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协议;第二,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比重不断加大,世界经济增长从制造业拉动转向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制成品贸易比过去更少;第三,可以使全球价值链深度扩展的技术发明没有出现,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也在减少。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国际分工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低迷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国际投资准入和开放的推进力度较慢;二是发达经济体开始重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制造业回流;三是对避税天堂的打击以及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行动计划虽然有利于各国公平地获得跨国公司的税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跨国投资活动。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趋于严重,阶层对立情绪蔓延。全球的收入不平等达到了非常惊人也非常危险的程度。收入不平等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国内部。不平等加剧不仅在部分国家内部引起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冲突,同时也导致许多国际冲突的产生。一般来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在一国内部总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较好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群体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则全球化的推动就会比较顺利;如果这些受损的群体得不到补偿,则他们就会反对全球化。贸易投资低迷降低了开放带来的收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也减少了在开放中受到损害的人群可能获得的补偿及其他机会,并使得反全球化的力量逐渐增加。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升高,金融市场风险积聚。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平衡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各国央行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危机过后,各国央行继续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

经济复苏。全球低利率以及部分央行的负利率已经使世界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陷阱,政策进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低利率和负利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利差收入和盈利能力,从而也降低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低风险及无风险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收益下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迫使他们转向高风险的投资,这在短期内会加大资本市场的风险,长期则会影响这些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盈利稳健性。全球债务水平的持续上升和低利率及负利率政策,使各国公共部门负债累累,主权债务危机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损害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经济周期不同步,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

特朗普上台增添美国经济不确定性。长期来看,特朗普的政策组合有可能会加剧美国面临的问题。第一,在减税的同时增加政府支出,必然导致美国联邦赤字攀升,政府债务率高企;第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引致强势美元,将会对美国商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第三,贸易保护将阻碍美国发挥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被削弱,将影响美国生产率的回升,降低经济效率;第四,驱逐移民使美国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减少,并加剧其人口老龄化。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2017年可能延续并加大预期管理的运用力度,实际加息次数应该不会超过两次。目前来看,过快加息并不利于促进美国经济:一方面,利率走高将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减弱;另一方面,加息提高资金借贷成本,将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所以这也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经济相互交织,欧洲发展前景不明。从经济基本面看,虽然2016年三季度以来欧洲经济出现好转,通胀有所回升,但从全年看,欧洲经济依然疲弱,部分指标比2015年有所下滑。同时,通胀的回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在美国页岩油供给压力下,预计2017年原油油价上升幅度有限,通胀水平难以持续高位运行,因此对目前经济的反弹不宜过度乐观。从欧洲政局看,2017年法国、德国将进入大选年,政治不确定性和分裂风险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英国“脱欧”方面,虽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将退出欧洲单一市场,收回边境控制权的政策立场,但同时她又表示希望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该政策能否顺利推进,仍存在疑问。意大利方面,2016年12月初结束的意大利公投并未通过宪法改革方案,这也可能对2017年欧洲的政治经济局势产生扰动。从政策层面看,考虑到目前欧盟各国财政负担较重,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高企,均突破了欧盟设定的警戒线,这也使得欧盟各国的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货币政策更加难以收紧。

发展中国家良莠不齐,受世界影响未来难以预测。贸易保护兴起,新兴出口或“受伤”。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对出口贸易较为依赖的新兴经济体或更“受伤”。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竟然居各国之首。特朗普有着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作为美国主要逆差来源国的中国、墨西哥、越南、印度、马

来西亚等,可能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更大。美元周期警惕风险,长期看好中印。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各主要新兴货币都紧盯美元,所以美联储加息以及美元强势会直接冲击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作为人口大国,本身就具有较大的需求潜力,印度未来的人口红利要好于中国,而中国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优于印度。长期来看,只要中印坚定改革之路,经济很有潜力,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会表现更好。

沉着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抓住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

拿出定力,积极面对世界经济新情况。面对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性,面对欧洲何去何从的不确定性,面对朝鲜半岛、叙利亚危机问题,中国一定要拿出定力。首先,要确保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确定性,确保我们无论在多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确定性。有了这些确定性,我们可以成功化解各种不确定性,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沟通交流,实现中国和世界尤其是中美的继续发展的确定性。实现这种确定性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其次,中国可以量力而行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中国应积极参与与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国际经济规则的改革,积极参与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积极参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

拿出魄力,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拿出实力,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背景下,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拓展外需仍大有可为。应提升中国产品价值链地位,促进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带动国内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在双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结合我国自身要素特点和优势,有效利用全球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完善对外投资体制,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国际化经营,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跨国公司,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2011年3月,利比亚爆发全面内战,人们希望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结束卡扎菲42年独裁统治,以期通过公正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正直的总统,带领他们走出国家治理不善、法治缺位的困境,进而走向自由、富裕、文明的新生活。但事与愿违,从2011年10月国内主要战事结束至今,利比亚一直未能享受些许消停、片刻安宁。不仅经济发展毫无起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内各种流血冲突事件更是不时见诸报端。

利比亚地处北非中部,占据南接非洲、北通欧洲的重要地理位置。因盛产优质原油曾经富甲一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高居非洲各国之首。而如今利比亚不仅深陷部落纠纷和军阀混战不断的泥潭,还成为西非、北非极端组织不时“光顾专访”之地。处于政治转型时期的利比亚,之所以出现国家重建进程波折起伏、变乱不断的状况,主要是受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国民意识缺失、国家观念淡薄。利比亚以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是在外力强制作用下进行区际整合的结果,是由欧洲殖民者根据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居住地域分布,强行揉捏拼凑而成的合众邦国。历史上地理意义上的利比亚地区是尼罗河中下游谷地以西、撒哈拉沙漠北麓以及阿斯特拉山脉以东之间,费赞、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昔兰尼加三大地貌四陷区域的泛指统称。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约束限制,利比亚的行政区划很大程度上由地理分界和历史传统所决定,从而导致三大单元政区自成体系,形成整体趋向同构、局部尽显差别的人文地理特征。卡扎菲时代虽然总体奉行依托西部、拉拢南方,共同“盘剥压榨”东部的统治思路,但他通过强力手段搞居间平衡的策略,基本还能够维系政权的大体平稳有序。而当卡扎菲统治结束后,利比亚原有的宗派势力格局随之瞬间坍塌,新的政治秩序和行政结构却仍然还处在“且行且摸索”的转轨重塑阶段。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决定了利比亚难以冲破和消弭央地权斗、各自为政的藩篱,部落观念深重、国家意识欠缺则进一步加速和催化地域区际之间的固有矛盾。

第二,府院权争、教俗政争、帮派竞争堆叠聚合效应。尽管利比亚在国家政治形态上是一个世俗化、城市化进程相对较高的阿拉伯国家,但同样在社会生态层面,宗教思想仍旧对众多政党团体和社群组织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号召力和组织动员力。因此,自利比亚建国以来,其国家发展道路便一直受困于教俗两大势力群体之间的权争派斗。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的伊斯兰政党在战后首次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团。2012年10月,世俗派参选人扎伊丹战胜穆兄会背景的公正与建设党候选人成为总理,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控制了国民议会,随后教俗两派对国家政治主导权的争夺愈演愈烈。按照过渡时期的权力分配,利比亚国民大会既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构,内阁政府则作为行政部门来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但在实施过程中,利比亚多届由世俗派组阁的临时政府,不满国会集议立法和行政于一身的揽权行为,在如何协调处理议会收权和放权问题上的缠斗不断,多次出现上演“府院之争”的剧目。

利比亚为何内乱不断?

2014年3月中旬,宗教势力把持的利比亚议会决定免去任职一年之久的世俗派代表扎伊丹总理职务,从而掀起利比亚教、俗政党及其武装派别围绕国家权力的新一波对战。在此期间,先是宗教势力借助占据国会多数的便利罢免世俗派内阁要员,随后世俗势力联合各方派系强力反击并逐渐取得优势,并在2014年6月25日举行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宗教势力则遭受重挫失去独掌议会的资格。7月,利比亚支持世俗力量与宗教派系的两股民兵武装爆发激烈的冲突,并各自分别成立全权代表国家“唯一合法性”的政府和议会,利比亚出现以的黎波里为中心宗教势力支持的“救国政府”和以图卜鲁格为中心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政府,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至此利比亚局势已全面失控,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接近绝望崩溃的边缘。尽管在联合国和欧美政府的斡旋下,教俗两派同意结束分裂于2016年1月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但两派势力仍然难以真正做到和平并存、友善共处。

由此不难看出,利比亚处于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渡阶段,所以出现热点密集排布、矛盾扎堆涌现的问题,除有体制转型阵痛导致政局走势复杂多变、纷繁杂乱的原因外,利比亚原有的社会传统和政治结构由于西方外部势力不负责任的干涉而崩塌,其后西方外部势力又对利比亚乱局无法有效规划管制,才是引发时局震荡的关键要因。事实上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承认,在干涉利比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缺乏计划,是总统生涯中作出的最大错误决定;对利比亚国情的估计不足和盟友不够“给力”是造成利比亚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如今的利比亚已像一列失控的火车,似乎在不可逆转地滑向灾难的深渊,未来政局走向也将更加纷繁复杂、变幻不定,其能否实现民众热切期望的从大乱到大治的蜕变仍是很难预料的结果。